

## 民俗采风

## 火红的春联写起来

蔡华先

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挑喜庆的大红春联贴于门上,辞旧迎新,接福纳祥,烘托喜庆的节日气氛,让年味更浓更醇厚。

写春联、贴春联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是传承了上千年的重要年节符号。春联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代的桃符,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当时的桃符是长六寸、宽三寸的桃木板,上面书写神荼、郁垒二神的名字,用于驱邪避灾。到了五代时期,后蜀孟昶在桃符上题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句子,这被认为是最早的春联。宋代时,桃符逐渐由桃木板改为纸张,称为“春贴纸”。“千家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的诗作《元日》,描写的就是那时人们过年时的几个有代表性的生活情景,其中之一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是贴春联。

到了明代,春联正式被称为“春联”,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成为人们表达美好愿望和祈求幸福的重要载体。至今还流传着明太祖朱元璋与春联有关的一个民间传说。

朱元璋在位时,曾特别下令要

求金陵的每家每户在大年除夕之夜必须在红纸上写好春联并悬挂于大门之上,以示吉祥喜庆之意。相传这晚朱元璋微服私访,见所到之处都张贴着鲜红的春联,自然十分高兴。后来走到一处,却见门上没贴春联,朱元璋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屋主是一屠夫,不识字,也请不到别人帮忙。朱元璋听后,大笔一挥,写下一副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一时传为佳话。

直到今天,过年时年货多买一点少买一点没有什么要紧的,但过年的春联必不可少,红彤彤的春联一贴,那过年的气氛马上就充盈起来,庭院生辉。春节串门,不管走到哪里,每家每户,迎面看到的都是那一抹红彤彤的喜庆春联,渲染着红红火火的中国年。

只不过,因为时代的不同,早些年,在农村,人们识字不多,大多是请人写春联。如今,机器印刷出来的春联更受人们的青睐。刚进腊月门,年味就开始在大街小巷里慢慢发酵着,逐渐地浓厚起来,集市上、商场里都摆上了春联。送春联的、买春联的,不管是都市还是乡村,人们都开始忙碌起来,为自

家选一副称心如意的春联。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对于我来说,更喜欢自己写春联。我一直感觉,春联还是自己手写的才有味道。春联,要表达自己的期待、自己的愿望、自己的祝福,这种心情又岂是一副印刷的春联可以代替的?看看满大街那种印刷的春联,装帧气派,色泽光亮,但内容大多俗套,千篇一律,看多了,会让人产生审美疲劳。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书法爱好者,书法水平并不高,但是,我还是喜欢自己构思、自己书写春联,个性化的春联才更有意味。

如今已进入腊月,很快就要过年了。我也很早就开始忙着准备过年的春联。

火红的春联纸裁起来,浓浓的墨汁倒出来,提笔凝思片刻,落笔成书,转眼之间,春联就摆在了地上。

瑞日芝兰光甲第,春风棠棣振家声。春联,是笔尖上历久弥香的年味,是民俗中传承千年的宝藏。其实,过年过的就是一种气氛,过出自己的风格来。火红的春联自己写,这样的春联才最有味道。

## 贴年画

程绍堂

自打我记事起,每年过春节父亲都会贴年画。父亲说,过年贴年画与贴春联同样重要,只有贴上年画,家才喜庆,才有年味,才像过年,才舒心。

进了腊月门,父亲就会赶腊月集,除了买些过年用的东西之外,总要买几张年画。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最崇拜英雄人物,尤其喜欢带有毛主席画像的年画。

父亲买的年画中除了应景和带日历的,总少不了带有毛主席画像的年画,《三国演义》中的五虎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花木兰充军》《武松打虎》《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剧照,以及赵一曼、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等电影里的英雄人物年画都买过,山水花鸟画尤其是牡丹、梅花、孔雀、凤凰、喜鹊等年画,几乎年年买。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年画题材喜庆,色彩丰富,人见人爱,给人的感觉是贴近生活,接地气,充满正能量,健康向上的气息扑面而来,令人看后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特提精气神。

父亲说,年画的图案都有一定的象征和寓意,例如:公鸡象征着吉祥如意,老虎寓意驱邪除害、祛凶引福、镇宅辟邪,鱼、莲花、蝙蝠等寓意着富饶、和谐、幸福,花鸟、风景可以起到宁静、和谐、繁荣的氛围。总之,父亲说,每一幅年画都有美好的象征和寓意。

到了过年的前一天,父亲就会把家里的旧年画换下来,贴上新买来的年画。父亲对贴年画颇费心思,多有讲究,他喜爱的年画,从来不用糨糊贴,总是用高粱穗秸劈成两半,用小钉钉牢,这样既不过分损坏年画,还容易往下揭。因为用糨糊贴上去,想完好无损地揭下来是很难的,一般只能贴一年。有了图钉后,父亲一律用图钉贴年画,使年画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损坏。还有,哪幅年画贴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很讲究,绝不随便乱贴。

带有毛主席画像的年画总是端端正正地贴在炕间(卧室)三抽桌的正上方,一进房门一眼就首先看到,英雄人物贴在炕间对面墙壁上,山水花鸟之类的多贴在窗户的两边和正间的墙壁上,带日历的则必贴在炕头外边的上方,以便于随时看日期。

年画贴好后,父亲总是再仔细端详一阵子,发现哪幅贴得不熨帖或不正,就立马重新整好,直至满意为止。随后,便悠然地坐在炕头上不紧不慢地吸着旱烟,开始欣赏一幅幅年画,浓郁的年味儿充满了房间,父亲的脸上洋溢着舒心的笑容。

出了正月十五,除了应景的年画,父亲都会小心翼翼地把它揭下来,然后用报纸仔细地包裹起来,放到大衣柜里,等到来年再贴。或许是为了省钱,也或许是崇拜心中的偶像,许多年画都是今年贴了明年贴,直到太过陈旧或无法再贴为止。在我印象中,有一幅毛主席的画像和《三国演义》的五虎将年画至少贴了七八年。

小小的年画,给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无声地感染、熏陶了我,使我幼小的心灵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大自然的热爱,培育了我的审美观,滋润了我成长。

## 饺子为何叫“箍扎”

刘甲凡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沥沥拉拉二十三……”我小时候曾问爷爷,过年为什么还要分出大年和小年?

爷爷告诉我,这个规矩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留下来的。朱元璋年轻时家里非常贫穷,有一年到了年关,他想在肉铺里赊几斤猪肉回家过年,老板不肯。因为猪头便宜一些,他说那就赊一个猪头吧,可老板还是不同意。朱元璋干生气也没办法。心灰意冷之际,他便随手用瓦片在肉铺门口的墙壁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可怜可怜真可怜,别人有年我无年,赊个猪头要现钱。有朝一日当皇上,老子要过两个年。”后来,他当皇帝后还真就这么定下了规矩。

不管爷爷说的是否靠谱,我是打心底盼望着过这个小年的,因为这一天不光能吃到一颗核桃大的糖瓜,还能吃上一顿“箍扎(饺子)”。尽管“箍扎”的面皮用的是黑乎乎的二麸面,馅子是萝卜丝儿,但在以地瓜为主粮的困难年月,这就属改善生活的好饭,每都能吃得大肚溜圆、饱嗝连连。

“二麸面”是家乡的方言说法。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用石磨来加工粮食,小麦通常需要磨三遍才行。第一遍磨下来的面粉叫“头白面”,是留待过大年蒸大饽饽“出门(走亲戚)”或招待客人的。平日

里改善生活包“箍扎”、擀面条就用“二麸面”。最后的“三麸面”,是用麦麸掺着黄豆和地瓜丝儿磨出来的,只能用来包菜角子(菜包)或擀烂面汤。

把饺子叫成“箍扎”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可究竟是哪两个字,却一直没有定论。有人因饺子属面食便写成“餠餠”,有人取包饺子时手上的动作而写成“箍扎”,也有人因饺子胖鼓鼓的外形就写成“鼓炸”。还有一些地方,言之凿凿地把这两个字写成“姑扎”,说是因为每逢大年三十下午,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要指挥儿子们洒扫庭院、裱糊窗户、张贴门对和年画。内当家的母亲,则要急火火地为众儿女赶制衣裤鞋袜,而包饺子这个任务,则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家中姑娘们的身上。此事因系姑娘所为,且包饺子必须用手“扎”一下,取“姑”和“扎”两个字,“姑扎”一说便由此诞生。在我们家乡还有一个更离奇古怪的说法,用大白菜和着新鲜猪肉包的叫饺子,用萝卜丝儿和着“肉滋啦”包的才叫“箍扎”。

“肉滋啦”也是方言说法,指的是肥肉焯完猪大油后剩下的渣滓。生产队那些年,猪肉限量凭票供应,只有过年期间,才能格外多供应一些。每年小年前,村里就组织杀年猪,为的是社员过小年时能改善一下生活。妈妈把分得的几

斤猪肉拿回家,总是仔仔细细地把肥肉和瘦肉分开,瘦肉用“冰缸”冻起来留待过大年,肥肉则切成细碎的肉块,在大锅里焯出喷喷香的猪大油。焯完油的“肉滋啦”,就留待过小年和着萝卜丝儿打馅包“箍扎”。

因为当年大白菜也很金贵,过小年包“箍扎”用萝卜丝打馅子也就习以为常。记得每逢这一天,妈妈早早就把萝卜洗干净,用礞床擦成萝卜丝儿,放进大锅里烧开水焯一下,然后捞出来换着清水浸泡半天,等到了傍晚,就拌和上“肉滋啦”打馅子。

奶奶和妈妈忙着包“箍扎”的当口,爷爷则领着我哥哥张罗祭祀灶神老爷这件事。爷爷总是用干净毛巾把“灶马头(方言,灶神老爷像)”擦一擦,免得他上天时太过埋汰。“箍扎”煮熟了,要把第一碗供奉在灶神老爷像前,还要摆上一碗酒和几碟小菜,那糖果更是必不可少。爷爷说,灶神老爷吃了糖瓜把嘴粘住了,想说坏话也张不开嘴。酒喝多了醉得东倒西歪、一塌糊涂,就没有心思告密了。叩拜结束,爷爷就把旧“灶马头”从灶台的墙上揭下来,用劈裂的高粱秸秆夹住,在院子里点火焚化,就算是送灶神老爷骑马上天了。年复一年祭祀灶神老爷,始终少不了糖瓜和“箍扎”这两样贡品。